

# 史传叙事与古代历史小说的叙述者<sup>〔\*〕</sup>

江守义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史传叙事的特点影响到古代历史小说叙述者的诸多表现;就叙述者对人物的处理看,历史小说人物的奇异化色彩与史传叙事的虚构有关;就历史小说的叙述机制看,章回体的形成、史官式叙述、文献引入都直接受史传叙事影响;就历史小说的叙述介入看,多种形式的叙述介入是对史传“寓论断于序事”的发展和丰富。

〔关键词〕史传叙事;叙述者;叙述机制;奇异化;介入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1.011

小说成为明清文学的标志,与历史小说的兴盛不无关系。历史小说之所以兴盛,和中国的史传叙事又密切相关。<sup>〔1〕</sup>学界相关论述往往从某一具体作品出发,就题材、史传意识等方面展开论述,一般缺乏明确的叙事主体意识,更没有区分真实作者和叙述者。但史传叙事对真实作者和对叙述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真实作者和史传叙事的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本文集中谈史传叙事与叙述者的关系。

## 一、史传叙事的特点

史传叙事的特点主要有实录原则、春秋笔法、“典型化”特征、寓论断于序事、假论赞而自见,前二者侧重于史家的叙事意图,后三者侧重于史传叙述的策略。无论是意图还是策略,对历史小说的叙述者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以史为贵”传统的形成,与史传叙事的实录精神息息相关。实录不仅是叙述者的如实记录,如班固所言“不虚美、不隐恶”<sup>〔2〕</sup>;更是叙述者对如实记录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的结果,如刘知幾所言“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如何进行道德判断,既要有史识,还要有史德,二者兼备,才能不因个人好恶而遮蔽叙述对象自身的好坏,才能“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真正做到“善恶必书”。<sup>〔3〕</sup>要做到实录,就需要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征在于尚简用晦。<sup>〔4〕</sup>但春秋笔法不仅仅是“笔法”,同时也是春秋史官的一种价值评判方式,大约有三个方面<sup>〔5〕</sup>:一是“常事不书”,如此,被载录者就需要有“此何以书”的疑问;二是“隐而不书”,或者是史官“通过缺失不载这一方法,表达自己的不认可,并提醒人们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或者是避讳,“为尊者讳,

作者简介:江守义,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历史小说叙事伦理研究”(项目编号:16BZW036)的阶段性成果。

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而不书并不是一味遮掩,也是一种臧否方式”;三是某些特殊的表达规则和用词规则,其陈述方式则显示了意义判断,其要义在于《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说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sup>[6]</sup>春秋笔法由此被认为是“微言大义”,如何“微言”?如何“大义”?就涉及到具体的叙述策略问题,涉及到史传叙事如何“典型化”以及如何在叙事过程中发表评论的问题。

史传的“典型化”首先体现在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来展开叙述。强调人物或事件的代表性,史传叙事展示的不仅是人物的行动或事件的过程,还包括人物或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普遍意义。从代表性出发,史传叙事的选材,不能完全局限于历史上的大人物或大事件,小人物或小事件也可以入选。如《史记》选人的标准是“倜傥非常之人”,<sup>[7]</sup>《陈涉世家》将陈涉发迹前和佣耕之人对话这样的小事也写进史传。其次体现在采用虚实结合的叙述手法。史传叙事如果给所叙述的人事增加一些奇异色彩,故事性会更强,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会更深刻。《留侯世家》写张良发迹前和老父的交往,就颇有传奇色彩。史传对小事件和传奇色彩的包容,都给史传的虚构开了方便之门。史传的基本要求是实录,但在古人看来,奇异之事有可能也是实际存在的,描绘奇异之事,最方便的就是虚构。史传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叙事过程中发表评论,具体表现为两类情况:寓论断于序事和假论赞而自见。寓论断于序事,即“凡是作者未发议论而在叙事中自有是非褒贬寓焉即为寓论断于序事,简言之,以事代论”。<sup>[8]</sup>它不仅可以通过选材、描写和人物话语这些看起来客观实际上包含史家倾向的方式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互见法、对照法等具体手法来完成。寓论断于序事是将论断隐藏在叙事之中,假论赞而自见则是对史传中的人事进行公开评论。论赞可以是史传开头的序论、中间的公开议论,更常见的是结尾的论或赞,形式多样。自《左传》“君子曰”以来,到范曄《后汉书》“论曰”

“赞曰”并举,形式上趋于完备的同时,假论赞而自见的史家用心也得到强化。

## 二、史传叙事与历史小说人物奇异化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强烈的“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下,叙述者基本上就是真实作者在具体小说中的代言人,但和真实作者不同的是,真实作者的意图需要通过小说背后的相关线索(主要是真实作者的“夫子自道”和小说问世的背景)才能获得,叙述者的倾向则需要通过对叙事文本的爬梳才能获得。其次要说明的是,由于叙述者只是真实作者的代言人,其叙述倾向总体上看,和真实作者的意图并无二致,因此,对叙述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其倾向如何,而是他通过哪些叙事手段来实现其倾向(当然,不排除极个别的叙事手段和叙述倾向相冲突的现象)。就小说内容而言,史传叙事的突出影响是叙述者将小说人物奇异化。

历史小说主要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就决定了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需要取材于史传,叙述者根据史传才能“敷演大义”,但历史小说毕竟是“演义”,需要突出某一人物的“与众不同”。简便的做法是从史传的虚构中汲取营养,将历史人物奇异化,这使得历史小说多少都带有一点神怪色彩。但和神怪小说人物的纵横变化不同,历史小说人物的神怪色彩不能让人物超越自身的历史归宿,它只是增强人物的传奇色彩而已;神怪小说人物的神怪色彩体现出人物的精神品质,历史小说人物的神怪色彩只是人物行为的点缀,基本上不影响人物的精神品质。历史小说人物奇异化主要是叙述者为了突出人物的神奇性,和史传在实录之外用奇异色彩来增强故事性如出一辙,此外,有时候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神奇”模式又可以从史传中找到源头。《左传》中就有不少梦兆、占卜的记叙,已经将《春秋》所记载的史事神秘化。<sup>[9]</sup>到《史记》,《高祖本纪》所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对后来的历史小说神怪化至少产生两方

面的影响:一是造成人物出生有异象的模式,不少历史小说介绍某个人物时,都描绘其出生时的奇异性。《盘古至唐虞传》说公孙轩辕母亲“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身怀有孕”,二十四个月后生下轩辕<sup>[10]</sup>;舜母“见天上大虹,有感而生舜于姚墟之地”<sup>[11]</sup>;《西汉演义》所言刘邦乃其母“梦与神交会”而生<sup>[12]</sup>更是直接搬用《高祖本纪》。二是奇异梦境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影响。《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三回,越灭吴前夕,文种和范蠡各自都梦见伍子胥乘白马素车和他们交谈,指引他们如何进吴都城;《开辟演义》第二十一回,黄帝“梦见大风将天下尘垢皆吹去。又梦一人手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sup>[13]</sup>于是根据梦兆寻找到风后、力牧,辅佐自己治理天下。

小说人物奇异化还表现在将某些人物附以“神力”。《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李存孝,勇冠三军,被康君立、李存信二人陷害,用五牛分其身,但五牛反被存孝用力“纵到身底下来”,此时“半空中现一金甲神人,叫存孝不得挣挫”,并告知存孝“原是上界铁石之精降临凡世”,现在已“功行圆满”需要“归天”,以防“神人夺了你的座位”,<sup>[14]</sup>于是存孝被害。史书记载存孝“骁勇冠绝”,<sup>[15]</sup>在小说中被归因于铁石精下凡,将历史人物“神”化,或许是人物奇异化的最简便做法;更有甚者,恰好存孝被害的时候,也是“功行圆满”需要“归天”的时候,这种今天看起来比较拙劣的机巧也不妨看作是人物奇异化的表现。如果说李存孝的“神力”基本上还是通过人的超常能力展示出来,《杨家将演义》中的文广、宣娘等人,就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神怪一样,变化多端,完全超出了人的能力,卷八“公正争先锋印”一章,文广和奉国都能化身十余个自己,且能在“云端飞来飞去”<sup>[16]</sup>;卷八“十二寡妇征西”中的宣娘可“飞上云端”,并能“吹气一口,化一道清风下去”,军队在法术的作用下,可变为“黄斑猛虎”。<sup>[17]</sup>历史小说至此已有神怪化倾向,实录已经完全让位于虚构和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在今天看来完全属于虚构乃至荒诞不经、在历

史小说中显得不伦不类的内容,在古人的观念中,却未必如此。自魏晋志怪小说以来,鬼神怪异之事就被小说家当作“实录”所认可,干宝《搜神记》,时人称之为“鬼之董狐”<sup>[18]</sup>;王嘉《拾遗记》,“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sup>[19]</sup>萧绮在修订时却声称“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sup>[20]</sup>作为晚出的历史小说,在“史统散而小说兴”<sup>[21]</sup>观念的影响下,自然不会对史传亦步亦趋,但难免会受到神怪小说将鬼神行为看作“实录”的影响,在小说中将历史人物和鬼神交织在一起。所以,今天看起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在历史小说中却频繁出现。

人物奇异化受史传影响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后来的历史结果来推演此前的人物行为和情节发展。《英烈传》第五回,少年朱元璋砍柴时身陷淤泥之中,就在他“自分必遭淹死”之时,很多小鬼将他救了,理由是“皇帝被陷了,我们快去保护,庶免罪戾”。<sup>[22]</sup>就小说情节发展逻辑来看,在朱元璋早年落魄时分用他未来是皇帝的理由来救他,实在是不合情理,但在叙述者心目中,既然是写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的故事,就要时刻提醒自己,皇帝的身份对整个故事都有制约作用,遇到故事进展对皇帝不利的时候,正常的逻辑无法让事情朝着有利于皇帝的方向发展,就用这种反向推演的方式来推动故事发展。历史小说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樵机闲评》第十八回,魏忠贤快被水淹死,在“一灵不冥”,魂魄游荡之际,被神道因“天数使然”而让他回阳世。<sup>[23]</sup>所谓“天数使然”,也是叙述者因知道魏忠贤后来发迹而寻找出来的让他活下去的理由。这种情况在历史小说中的反复出现,说明在叙述者心目中,史传的影响是潜在的、深入骨髓的,他明白自己在讲一个结局已经明了的历史故事,为了不违背历史结局,可以在关键时刻借助鬼神来改变故事进程。

### 三、史传叙事与历史小说叙述机制

就小说的叙述机制看,章回体的形成、史官



式叙述、文献引入都与史传叙事有一定关系。

历史小说是真实作者“按鉴”演义的产物，如何落实“按鉴”演义，就需要考察叙述者如何展开叙述，如何在“按鉴”叙述中逐渐形成并完善历史小说的章回体叙事。其一，就章回形式的初衷看，是为了提供小说的内容梗概，让小说眉目清楚。起初的历史小说分卷分则，每则根据内容拟个题目，这应该是受《通鉴纲目》影响所致。《通鉴纲目》之所以比《资治通鉴》更受小说家欢迎，主要在于前者有“纲目”，既易于查找具体内容“纲目”所对应的相关内容，又方便浏览全部的内容概要。早期的历史小说，比照《通鉴纲目》的分纲列目，先对小说分卷，然后在每卷之中再分则，好让历史人物和故事的眉目更加清楚。其二，就则目的具体内容看，由于历史小说基本上参照《通鉴纲目》内容来演绎，历史小说的回目很自然地与《通鉴纲目》相关内容一致。熊大木《全汉志传》（12卷本）“西汉六卷”的则目依次是：“汉宣帝承统登基”“李陵回答苏武书”“霍氏谋反遭族诛”“疏广致士荣还乡”“赵充国计破先零”“赵充国进屯田计”“杨恽放肆遭诛戮”“陈宣大胜康月氏”“朱云谏君折庭槛”，除“赵充国大破匈奴”“陈宣大胜康月氏”二则外，其他各则与《通鉴纲目》中卷五“秋，七月，迎武帝曾孙病已入即位”，卷五“苏武还自匈奴，以为典属国”，卷五“秋，七月，霍氏谋反伏诛，夷其族”，卷五“疏广、疏受请老，赐金遣归”，卷六“先零羌杨玉叛……赵充国将兵击之”，卷六“留充国屯田湟中”，卷六“杀故平通侯杨恽”，卷七“朱云上书……攀殿槛，槛折”大致对应，基本上就是对《通鉴纲目》相关内容的摘录和简化，只是将《通鉴纲目》中的内容概括为七个字而已。其三，就章回形式的演进看，历史小说最初分卷分则，却没有分回，每卷标明次序，每则却不标明次序，只有标题。随着小说的刊刻和相关经验的积累，章回形式至少在两方面有质的改进。第一个方面是分回，分回和分则的根本区别是分回在回目名称前标明次序，分卷和分回的结合，小说的具体内容更容易被定

位，也容易被查找，既可以防止内容的重复，也可以加强前一回和后一回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妨以《列国传》的三个版本为例稍加分析。余邵鱼的《春秋列国志传》“目录”处分卷列则，既不标明每卷有多少则，则前也不用数字来显示次序，在正文中每则标题缩两格另起行。余象斗的《片璧列国志》“目次”处分卷列回，“一卷”两字后用小字标明“十九回”，但每回回目前无次序，在正文中每回标题缩两格另起行，标题前标明“第一回”“第二回”字样，但“目次”中的前十六回在正文中每两回成一回，这样，正文中的前八回中，每回其实都含有“目次”中的两回内容，由于回目都缩两格另起行，所以前八回中都出现了回目前无次序的另起行回目的情况（这与《春秋列国志传》正文中的“则”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此而言，《片璧列国志》所说的“回”比《春秋列国志传》的“则”有所改进，但不够彻底，“目次”和正文中的回目不一致，或许是粗心所致，但也显示出叙述者对回目的用心不够。冯梦龙的《新列国志》进行了较大的改动，“目录”处只列回不分卷，单起一行标明回次，然后另起行缩一格写回目名称。正文与“目录”一致。叙述者显然对回目很重视。第二个方面是回目内容上的用心，由单句到偶句的变化不仅是形式的变化，更是叙述者对内容的理解和对叙述的调整。《春秋列国志传》“目录”处第一卷前四则分别为“苏妲己驿堂被魅”“云中子进斩妖剑”“西伯侯入商得雷震”“西伯陷囚羑里”，正文中第四则“西伯陷囚羑里”写成“西伯侯陷囚羑里城”，显然，叙述者只求概括内容，对回目名称并不讲究。《片璧列国志》“目次”处第一卷前四回分别为“苏妲己驿堂被妖”“云中子进斩妖剑”“西伯入商得雷震”“西伯陷囚于羑里”，字数一致，比《春秋列国志传》要讲究一些，但正文中的标题与“目次”不尽一致，“苏妲己驿堂被魅”“云中子进斩妖剑”为第一回，“西伯侯入商得雷震”“西伯侯陷囚羑里城”为第二回，正文中的回目标题一如《春秋列国志传》。《新列国志》每回标明次序，如第一回

“周宣王童谣发令 杜大夫厉鬼报冤”，第二十四回“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虽然回与回的标题之间字数不尽一致，但每回都用对偶的两句作标题，总体上看还是相当讲究的。而且回与回之间的衔接也比《春秋列国志传》和《片璧列国志》要好得多。基本上做到了余象斗在《题列国序》中所说的“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sup>[24]</sup>章回体逐渐走向精致化，主要是叙述者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与史传叙事应该关系不大，但章回体最初的形成，与史传叙事却关系密切。有论者指出：虽然章回体的形成与话本模式有关，但叙述者“以节录史书、自成段落、再立标题的敷演形式为主”，主要还是受《通鉴纲目》的影响所致。<sup>[25]</sup>

受史传叙事影响，历史小说还表现出史官式叙述格局。具体表现大致有：（一）全知视角。叙述者对所叙述的故事，全知全能，不仅知道所有故事的来龙去脉，提前知道故事的结局，也知道人物的内心想法。因为他是在讲一个已经过去的盖棺论定的故事，站在“事后”洞察一切的立场上去展开叙述，犹如史家写史。（二）直笔论道。史家传统之一就是直笔论道，如实记载历史，“不虚美，不隐恶”，叙述历史的同时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品第人材，以示劝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职也”。<sup>[26]</sup>历史小说在叙述时，往往自觉地将道德劝戒作为自己的当然要求，因此，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其实是有选择的。如《新列国志叙》所说：“往迹种种，开卷瞭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诫，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sup>[27]</sup>（三）果报模式。不少历史小说将历史故事和人物纳入到因果报应的大框架中，这似乎是受到佛家影响。但细究之，果报观念并非佛家所独有，而为儒道佛共同所有。就决定史传传统的儒家思想而言，《尚书·汤诰》云：“天道福善祸淫”，《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儒家的这种果报思想导致史传中也有强烈的果报意识，许宝善甚至说：“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

书。二千年间，出尔反尔，倖得倖失，祸福循环，若合符契，天道报施，分毫无爽。”<sup>[28]</sup>史传中暗含的果报观念对历史小说的叙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国演义》开头所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不妨看作是分合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分分合合的历史既然互为因果，写分合变化的历史小说自然也可以采用果报模式。写英雄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写奸邪的《梼杌闲评》，直接采用果报模式；基本纪实的《混唐后传》，最后竟通过仙家张果之口，说出了朱贵儿与隋炀帝旧世之夙缘，转而为唐明皇与杨贵妃今世之纠葛，“事虽荒唐”，但冥冥之中或许真的有此“账簿”，“登记此类以待销算”。<sup>[29]</sup>这说明，无论是外在的框架结构，还是内在的思想观念，果报模式都已成为历史小说的一种叙述程式。（四）天命观。天命观暗合果报模式，但果报模式是从作品的外在结构或内在观念中看出来的，天命观则隐藏在历史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之中，它没有形成一种模式，但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观念，往往用来解释小说中不好解释的现象。在史家看来，虽然人事纷纭复杂，但背后都是天命主宰。《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认为天命即隐藏于人事之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sup>[30]</sup>史家的天命观对小说家影响深远，历史小说往往有“今古兴亡数本天，就中人事亦堪怜”<sup>[31]</sup>的感慨，在叙述过程中，动辄以天命来解释人事行为，《英烈传》第三十六回，陈友谅逃过一劫，叙述者认为“是他的天命未尽，故得如此”。<sup>[32]</sup>

历史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叙述过程中的文献引入，这与史传叙述依靠文献如出一辙。文献引入在历史小说中的表现多样：（一）在叙述过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引入历史人物所作的表、书、赋等，这样的引入没有打断叙述的线索，显得很自然。如《英烈传》第二十三回引张士诚给太祖的假意求和书以及太祖的“回檄”，第二十六回引张士诚奉表，第三十一回引刘基的表章、宋濂的词、太祖的《江流赋》，等等。这样的引入“不

仅容易模仿,而且又可增强作品的史实感”。<sup>[33]</sup>

(二)为引入文献而引入文献,扰乱了叙述进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三“韩世忠镇江戍兵”一节,引入岳飞拜五岳庙所作“盟记”,与上下文均无关系。岳飞遇害后,还有岳飞的几篇文献没有引入,于是叙述者以“岳王著述”为标题“另录出于王之终章后,以便观览”,似乎讲岳飞的故事就要将岳飞本人所写的文献全部录入才行。<sup>[34]</sup>同时,该书还大量引用朝廷及其他官员所作的各类文献,卷三“胡寅前后陈七策”一节,抄录的第三策到第七策,占该节绝大部分篇幅,而第一策和第二策又抄录于上一节“洪皓持节使金国”最后,在第二策和第三策之间,硬生生加上“胡寅前后陈七策”这一节目,对小说叙述来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三)对照引入文献。在叙述故事之后,将史书上记载的相关内容抄录在后面,以示前面的叙述有史实依据。对照引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抄录史书,如《东西晋演义》西晋卷三“勒责王衍乱天下”一节,在叙述石勒杀害王衍及司马越宗族之后,叙述者停止叙述,以“史臣断八王曰”引《晋书》卷五十九卷末对八王先后用事的长篇评论,<sup>[35]</sup>对此前关于八王用事作一个概括性的复述和总结。二是节录改写史书,对正文内容作补充,中断叙述流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在讲到钦宗皇帝即位后,缩两格写道:“按《通鉴》,帝讳桓,徽宗长子也。初封定王,会金人入寇,徽宗遂传以大宝。在位二年,为金人所掳。绍兴末,殁于沙漠,寿六十一。”<sup>[36]</sup>《通鉴》及《通鉴纲目》均不记宋事,文中内容,与《纲鉴会编》卷八十三《宋纪·钦宗皇帝》大体一致。三是节录改写原文,节录开始时中断叙述,节录最后又连上叙述。《三国志后传》为了增强其真实性,经常在某个人物出场时,节录史书对该人物的介绍,人物介绍的最后又回到节录前的叙述流程。第八十三回陈敏欲反叛,想招揽甘卓,在“陈敏兄弟暗谋不轨,成否还是如何”之后,就引入文献:“按晋史,甘卓字季思……隐于江左。陈敏兄弟知其名,故谋召之。”<sup>[37]</sup>“故谋召之”回到

节录前的叙述,在节录改写之后,叙述者又继续前面的叙述:“当日陈敏欲谋不轨……”<sup>[38]</sup>叙述者主要引入《晋书》卷七十《甘卓列传》内容,但加以改写,尤其是将《晋书》中“弃官东归,前至历阳,与陈敏相遇”<sup>[39]</sup>改写成陈敏“谋召之”,与前文叙述相合。

#### 四、史传叙事与历史小说的叙述介入

史传的“寓论断于序事”对历史小说影响最为深远,它导致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叙述介入。如果说“假论赞以自见”主要影响到小说作者的评论,“寓论断于序事”则主要影响到叙述介入(即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介入故事)。介入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历史小说的题名和回目可见出叙述者的态度。像《全汉志传》《列国志》这样的题名看不出叙述者的态度,但很多历史小说的书名不是这样的中性立场,而是在书名中寄寓褒贬,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叙述者的价值判断。《英烈传》《于少保萃忠传》《辽海丹忠录》《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武穆精忠传》,用“英烈”“萃忠”“丹忠”“忠勇”“精忠”来赞扬历史人物的正面价值,《梲杌闲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剿闯小说》《痛史》,用“梲杌”(古怪兽名)、“奸”来直呼魏忠贤,用“剿”来表明对待李自成的态度,用“痛”来表明对宋室败亡的惋惜。回目中的倾向有时更明显。《英烈传》第一回“元顺帝荒淫失政”、第三回“专朝政群奸肆乱”,《后七国乐田演义》第一回“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位”,回目名称清晰地传达出贬斥的姿态。《三国志后传》第二回“二贤合计诛邓艾”,《西汉演义》第四十三回“韩信暗计智章平”,其中的“贤”“智”都是叙述者的判断。有些回目则通过忠奸善恶的对比,突出其伦理取向,《后七国乐田演义》第七回“齐湣王杀二忠臣以肆恶 乐元帅会五诸侯而出师”之“杀二忠臣以肆恶”,伦理倾向明显;《于少保萃忠传》第三回“虎丘山良朋相会 星宿阁妖魅惊逃”、《混唐后传》第二十七回“矢忠



贞真卿起义 遭疑忌舒翰丧师”，前后两句之间均形成反差。

(二)纪年方式和人物称呼暗含了叙述者的倾向。史传叙事对正统的重视,折射到历史小说中的一个表现是纪年方式。在统一时期,纪年没有问题,在分裂割据时期,叙述者一般以儒家正统思想统治的朝代来纪年。但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叙述者有时流露出矛盾心理。《东西晋演义序》要求“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sup>[40]</sup>在正文开头,也以西晋、东晋纪元在前,将十六国称为“伪十六国”,正文中往往将多国纪元并举,但都是将晋朝纪元放在前面,有时还标明其他国家的建立实乃僭越之举。如东晋卷八“炽磐乘虚执虎台”开头“甲寅,十年(秦弘始十六年,魏神瑞元年。是岁,南凉亡,大二小五,凡七僭国)”,<sup>[41]</sup>秉承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中所说的“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sup>[42]</sup>的思想,非常突出地体现出史家的正统意识。与纪年类似的还有人物称呼。凡是历史上成为皇帝的,小说叙述其发迹之前,也往往以帝号称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帝王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史传的影响。如《英烈传》第四回“真命主应瑞濠梁”,在朱元璋出生前就称其为“真命主”,自第五回朱元璋出生以后,叙述者就一直称其为“太祖”,这当然和作者是明代人有关,深究之,则是将后来的历史事实作为叙述的前提,这不符合一般的小说叙事,却是史传所认可的做法。史传记叙时,也经常将发迹前的人物直接称为帝王。《高祖本纪》自始至终称刘邦为“高祖”,虽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但由于写本朝皇帝,显得也很自然。史传中不符合历史情境的称呼影响到历史小说,有时会产生负面影响。《东西晋演义》西晋卷三“猗卢大破铁弗氏”一节,介绍郁律时说:“却说郁律资质雄壮,甚有威略,后号为平文帝”,下文一边说郁律发兵,一边“却说白部听知平文自引兵来”,此时郁律只是北魏穆帝的“太弟之子”,称其为“平文”,于叙述而言,实属不当。

(三)以夹叙夹议的形式来介入叙事。夹叙夹议即在叙述中夹有议论,这是叙述者表达自己意见的最常见手法。《柁机闲评》第十一回,魏忠贤听田尔耕劝他娶亲之后,觉得自己当初救人完全出于义气,现在听说对方有许多田产,“终是小人心肠,被他感动了”,<sup>[43]</sup>“终是小人心肠”这样的议论显示叙述者公开介入了叙事。夹叙夹议除了这种常见的形式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形式,即叙述同时是议论,同样的话语既可以说是叙述,又可以说是议论,叙述者在此暗地里介入叙事。《盘古至唐虞传》下卷最后一则开头,说尧即位后,“民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sup>[44]</sup>这可以看作是尧即位后情况的描述,但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叙述者对尧的赞扬和敬仰之情。历史小说有时在介绍人物的同时给人物以评价,这也是一种夹叙夹议,只是评价蕴含在介绍中,使得评价看起来好像是在陈述一种事实,叙述者介入不太明显。《柁机闲评》第十回,吴保安出场时,叙述者介绍他父亲“教他读书……谁知吴保安逐日同这班人在一处,遂习成了个流名浪子”。<sup>[45]</sup>“流名浪子”既是对吴保安的介绍,也是对他的评价。

(四)通过人物的处理来介入叙事。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其一,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来显示叙述者的态度。《西汉演义》中的韩信与萧何,都是刘邦的得力助手,但在处理和刘邦的关系上,二人迥然不同。韩信忠心耿耿时居功自傲,甚至有点率性而为,被刘邦削夺兵权后有叛反之心,由于轻信萧何而被萧何吕后谋杀。萧何受人诬告被刘邦下狱,却分辨,反让刘邦有愧疚之感。对照二人的行为,韩信、萧何均知刘邦为人,但韩信本性忠厚,才最终被害;萧何则只揣摩圣意,设计而杀韩信。叙述者忍不住借众人之口,说萧何“立谋擒信,及夷族之时,卒无一言劝止,何其不仁”。<sup>[46]</sup>其二,通过改写历史人物表明叙述立场。历史小说在虚构方面比史传走得更远,人物形象有时候也更鲜明,史传的“典型化”在历史小说这里冲破了史传大体上囿于史实的

藩篱。《柁机闲评》将魏忠贤和客印月的沉湎一气归结为他们早年的“明珠缘”，魏忠贤的出身，他和田尔耕、崔呈秀等人在发迹前的交往，他与傅如玉的姻缘，都是虚构出来的，又都有机地融进魏忠贤陷害忠良的历史事件中，而且，这所有的虚构以及真实的历史事件，都笼罩在因果报应的模式之下，为魏忠贤等人的恶行找到“复仇”的根源。更有甚者，在虚构之外，作者还改写历史，将本来属于阉党的傅应星写成魏忠贤的儿子，且出淤泥而不染。魏忠贤这样一个大“柁机”，却有一个明事理的妻子和一个辨忠奸的儿子。历史上的魏忠贤基本上被小说化，结果使本来善恶分明的伦理说教在虚构的情节和因果报应的模式中显得有些暧昧。可以说，史传传统的实录原则在《柁机闲评》中只是为虚构服务的，却虚构出一个活生生的魏忠贤形象，这说明叙述者的介入成就了历史小说的“典型化”。

(五)通过场面描写来介入叙事。场面描写时，叙述者可以在不动声色中表露自己的态度。《隋史遗文》第五十九回李世民杀单雄信的场面中暗含着叙述者对李世民的看法。秦叔宝等人为单雄信求情，“秦王道：‘前日宣武陵之事，臣各为主，我也不责备他。但此人心怀反覆，轻于去就，今虽投伏，后必叛乱，不得不除。’程知节道：‘大王若疑他有异心，小将三人，愿将三家家口保他。他如谋反，一起连坐。’……叔宝涕泣如雨，愿以身代死。秦王心中不说出，终久为宣武陵之事，不快在心。道：‘三将军所请，终是私情。我这国法，在所不废。’固执不听。”<sup>[47]</sup>李世民说秦叔宝等人所请乃是私情，其实他心中所记恨的才是私情。对话展示了李世民公报私仇、残忍无情的一面。叙述者看起来是描绘场面，但场面中暗含的讽刺、不满之意十分明显。也许出于对场面描写中暗寓褒贬的推崇，也许出于对单雄信的赞扬和惋惜，《唐书志传》《隋唐演义》均沿用了《隋史遗文》这段文字，表面上不加臧否的展示，实际上写出了李世民道德人格的缺陷。

以上五种方式，叙述者的倾向蕴含在同一部

小说中。有时候，通过不同小说的对照，也可以看出叙述者的倾向。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相同的历史事件，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叙述，叙述者的用意有别。同样是写后羿篡位的故事，《开辟演义》第五十六回用几百字，写后羿用寒浞、伯明，毒杀帝相而自立，紧接着下一回，后羿就被寒浞所害，寒浞谋害后羿的理由也没有交代，后羿死后，叙述者只用“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样一句套话加以总结。《有夏志传》在卷二用数千字篇幅详细地写了后羿收逢蒙为徒，逢蒙又带来伯明的后人寒浞，三人经过精心谋划，最终赶走夏王而篡位。后羿篡位上朝之日，天刮黑风，立朝之地下陷。后羿后来被逢蒙射杀，逢蒙又被寒浞谋害，射杀和谋害的过程写得都很详尽，也符合逻辑。对照《开辟演义》，《有夏志传》的叙述显然更有条理，条理的背后显示出叙述者更在乎君臣名分等纲常礼教，详细描写后羿等人的恶性，暗示对篡位行径的深恶痛绝。后羿临朝后，天地异样，“妖怪百出”，叙述者出面发表评论：“这是千古贼臣篡位之始，如何天地不变？”<sup>[48]</sup>叙述者还借“后人锺惺”（作者兼叙述者本人）之口对此加以感叹：“苟去仁义而利之怀，则三才五教之常，又何所其用惜？”<sup>[49]</sup>远不是《开辟演义》所透露出来的善恶有报所能涵盖的。

(二)对相同情境的不同历史事件的描述也可看出叙述者态度的差异。比如说，历史小说中，经常写到兄弟之间的事情。《新列国志》第十二回，公子寿探知卫宣公在别人撺掇之下要杀害同父异母的哥哥急子，于是将急子灌醉，代急子而死，急子酒醒后为营救公子寿，亦被害。“兄弟争死”的故事虽然罕见，但还是表明在列国时期，王室中仍有兄弟情谊。《东西晋演义》中的王室宗亲则为了王位而频繁地互相杀戮，如立国仅三十二年的后赵石勒一族，即有石虎杀石堪、石弘、石邃、石宣，石宣杀石韬，石遵杀石世，石闵杀石遵、石衍、石鉴，为了王位，兄弟、父子之间动辄相互杀戮，已毫无亲情伦理可言。对照《新列



《三国志》和《东西晋演义》，叙述者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列国时期的“兄弟争死”，叙述者引《诗经·卫风·乘舟》，“以寓悲思之意”<sup>[50]</sup>；对后赵时期的宗亲互戮，叙述者以“暴风拔树，震雷”<sup>[51]</sup>等灾异现象表达不满。

总之，古代历史小说叙述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物奇异性特点、多种叙述机制以及叙述介入，都与史传叙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小说的叙述者虽然在叙述中可以腾挪变化，但根本上仍然受到史传叙事的影响，历史小说的伦理立场根源在于史传叙事，这也是古代历史小说在伦理说教方面千篇一律的原因所在。

### 注释：

[1] 相关论述已有很多。如纪德君认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兴盛，“更得益于古代深厚悠久的史学传统”（《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一般将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幾《史通》的问世，看作史传传统正式确立的下限。

[2][7][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738、2735页。

[3][唐]刘知幾：《史通》，[清]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6-367页。

[4] 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5] 过常宝：《“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6][3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70、252-253页。

[8] 李洲良：《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

[9]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05-207页。

[10][11][44][48][49][明]钟惺编：《盘古至唐虞传 有夏志传 有商志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年，第36、55、51、167、171页。

[12][46][明]甄伟：《西汉演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6、313页。

[13][明]周游：《开辟演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14][明]钟惺、罗贯中：《混唐后传 残唐五代史演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15][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李存孝传》，《旧五代史》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14页。

[16][17]《杨家将演义 说呼全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1、200-201页。

[18]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7页。

[19]《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75页。

[20][21][24][27][28][29][31]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史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9、773、862、866、946、966、889页。

[22][32][明]郭勳：《英烈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112页。

[23][43][45]《柁机闲评》，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128、74、66页。

[25] 纪德君：《从历史演义看古代小说章回体式的形成原因及成熟过程》，《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

[26][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转引自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33][34]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63、263-264页。

[35][40][41][51][明]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115-116、1-2、501、281页。

[36][明]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页。

[37][38][明]酉阳野史编次：《三国志后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81、582页。

[39][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62页。

[42]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47][明]袁于令编撰：《隋史遗文》，再休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96-397页。

[50][明]墨憨斋新编：《新列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6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